

王顺彬 杨金荣等/译  
特约校订/邵东方



# 章学诚 的 生平与思想

(1738~1801)

(美) 倪德卫 著  
David S. Nivison

方志出版社

# 章学诚 的 生平与思想

(美)倪德卫 著  
David S. Nivison

方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 / (美)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著;王顺彬,杨金荣等译. —北  
京:方志出版社,2003. 10  
ISBN 7—80122—720—4

I. 章… II. ①倪…②王…③杨… III. 章学诚  
—人物研究 IV. B249.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798 号

### 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

---

著 者:(美)倪德卫  
译 者:王顺彬、杨金荣、余方德、张 勤、周祝伟  
特约校订:邵东方  
责任编辑:李 沛

---

出版发行: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12 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邮 箱 [zbsh@fzph.org](mailto:zbsh@fzph.org)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萧山日报印刷厂

---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

ISBN 7—80122—720—4/B·1

定价:32.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Copyright © 196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出版  
并授权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译本  
图 字:01—2003—7436 号

## 《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自序

我真诚地感谢为翻译拙作费心尽力的学者们，并对仓修良教授提出和支持这项翻译工作深表谢意。这本书是在多年以前（1966年）出版的。此书的撰写始于大约50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这本书实际上是我经过近20年写作研究的成果（不错，我现在已经年届80岁了！）。当我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时，在洪业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了研究与著述。正是洪教授向我介绍了章学诚的著作和观念。

在本书出版后，我未对章学诚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目前的中译本不能视作一部修订本。在此书撰写过程及出版之后，我发现，章学诚的思想使得我关注中国道德哲学和思想史上更为广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部分地体现于1996年出版的我的论文集《儒学之道》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之中，如我在1953年写的“王阳明之后中国思想中的知行观”。或许在章学诚的研究之后，我应该接着研究戴震（人们曾这样对我说）。但是我很清楚，其它学者在戴震研究上肯定要比我出色（我尤其钦佩余英时的大作《论戴震与章学诚》。较近研究章学诚的重要著作，还有仓修良的《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以及他与叶建华合著的《章学诚评传》。）。)

在研究章学诚多年之后，我还希望能够对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所有领域加以探索——也许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由于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感到困惑的难题而引起的一种兴趣，1971

年我在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对中国古代甲骨文和金文进行钻研。1979年,当我为关于西周铜器的研讨课备课之际,我竟意外地发现,长期被人们视为伪作的“今本”《竹书纪年》可以成为解释一些铜器铭文年代的依据。随着研究中不断的发现,以及论文接二连三的发表,到了1995年,我相信我已掌握了一部完整和确切的夏商周三代年表。我在研究中使用了金文、天文学、《纪年》,以及其它可能利用的材料。

我有时在想,不知古人章学诚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他可能如同崔述、钱大昕、王鸣盛以及其它18世纪的著名学者那样,在开始时可能会显得有些不耐烦,并认定“今本”是伪作。我们之间也许会有一些饶有兴趣的争论——这是他和我的一个共同嗜好。两千年三百年前,孟子曾说过:“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人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尚友也。”但愿如此。最后,我要向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致谢,感谢他们为支持海内外的章学诚研究而资助拙著中译本的出版。

倪德卫

2002年6月18日识于美国加州

## 《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序

美国斯坦福大学倪德卫教授所著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中译本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正式付印之前,参予翻译的同志要我为中译本写篇序,这也是我去年在美国期间答应过倪德卫教授的,即一旦出中译本,我一定为之作序。我与倪德卫教授交往已经十多年了,1987年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倪德卫教授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首先说明,他在上海一家书店购得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但书中既无自序,也无后记。因此也就无从得知我在什么单位工作。后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我的朋友汤志钧教授处打听到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信,约我去上海见面。不巧的是他所约定见面的那天,正是《萧山县志》出版召开座谈会,由于早已邀请,加之主编费黑的盛情要求“千万千万光临”。于是我只好给倪德卫教授发了一份特别长的电报,说明无法赴沪原因,并邀请他到杭州来作客、见面。遗憾的是他的回程机票早已买好,于是我们就这样失去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但是,他回国后立即就给我寄来了这本《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交往。因此,可以这样讲,我们之间的交往、友谊是由章学诚为我们建立起来的。去年4月间我到美国之后,在电话交谈中,我告诉他,浙江省志办已将翻译他这部著作列入2000年重点工作计划,他听了非常高兴,并主动为做好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关资料。我在8月初回国前和他一次通话

中,他还表示,如果在中国召开章学诚学术研讨会,他一定参加,并且要和他过去的博士研究生艾文和(P. J. Ivanhoe)(现已是密执根大学的教授)一道来参加,因为这位教授正在汇编全世界研究章学诚的有关论著。一位年事已高的美国学者,居然对章学诚研究是如此一往深情。此种精神,值得学习。

外国学者研究章学诚,倪德卫教授不算最早,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20世纪初首先编纂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还发表了,《章学诚的史学》等。后来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教授便写出《章学诚及其史学》一文,称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可以与阿拉伯的史家伊本凯尔东或欧洲最伟大之史家并驾齐驱。正如倪德卫教授在他这部著作的《导言》中所说:“凡是阅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很自然的会相信章学诚是中国造就的最有魅力(最迷人的)的思想家之一。”非常遗憾的是,这位戴密微教授在70年代末曾托云南一位学者打听我的下落,可惜当1986年我得知此信息时,再一打听,这位教授已于1979年去世。而倪德卫教授从1942年就已经开始接触章学诚的著作,1953年他以章学诚为题的博士论文通过后,便正式开始撰写此书,直到1966年出版,历时13年之久。其撰写过程,在自序中都有详细说明。此书是外国学者研究章学诚篇幅最长的一部。80年代以后,韩国学者中先后有多位学者从事章学诚研究并发表了论文,中央大学教授权重达写过《章实斋之博约论》、西江大学教授曹秉汉写过《章学诚儒教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其政治的意味》、中北大学教授崔秉洙写过《章实斋史学方法论》、《章学诚方志学试论》、《章学诚史学上“述而不作”》、《章学诚的史书体例论》、《章学诚的方志体例论》、《关于章学诚方志理论的研究》和《章学诚的良史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研究章学诚的论著,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这些事实说明,章学诚早已用他的杰出学术思想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已不仅是世界史学名家了。他的学术思想早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知识宝库中

可贵的财富,这自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面对这些事实,那些长期来一直在贬毁章学诚的各种言论,自然也就无需去辩驳了。

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该书《导言》中对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章学诚在中国学术界长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地位而深感遗憾,他说:在中国“研究章学诚的学者绝大多数是专业历史学家,他们着重研究章氏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特别是他的方志学理论。因此章学诚是作为一个史学方法评论家而为人所知;相对来说,他的校讎学和文学批评思想则很少有人感兴趣。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章学诚在哲学史上还未得到一个公认的位置。但我深信,章学诚理应得到作为中国哲学家的重要地位。承认这一点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就是说,在倪德卫教授看来,章学诚不仅是一位史学评论家,而且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而后两者的确很少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哲学史上,从来不被哲学史论著所收入,而文学理论批评史有的著作中还是有所收入。总的来说,倪德卫教授当时指出的国内对章学诚研究现状,确实就是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把章氏当作史学评论家和方志学奠基人。其实章学诚在哲学思想、文学理论、校讎学、谱牒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贡献,随着人们不断的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也都才逐渐为人们所发现。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先生 1956 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第五卷中单立了《章学诚的思想》一章,而该章的第三节则是《章学诚的哲学思想》,也许因为条件限制,倪德卫教授很可能并未看到过此书,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没有谈到过,连侯外庐先生的名字也未涉及到。而关于章学诚的文学理论方面,朱东润先生 1944 年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批评大纲》中也已立了专章作了评论,该书 1957 年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倪德卫教授很可能也未见到过此书。值得庆幸的是,正如倪德卫教授所预言,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现在已经为我国学术界所公认,我国著名学者匡亚明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思想

家评传丛书”中,就有《章学诚评传》。而此评传正是由笔者负责撰写。我们在撰写评传时,正是从思想家角度入手,因而在叙述生平 and 时代背景以后,首先列了《倡言改革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两章,而对于倪德卫教授所指出的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校讎学和文学理论思想也都列有专章论述,而史学思想、方志理论以及谱牒、教育等思想,同样都有专章,以体现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学问之渊博。至于对章氏的文学理论方面,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也都相当重视章学诚文学理论的研究和评论。只有哲学界至今似乎尚无人问津。

倪德卫教授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对章学诚的生平、学术著作、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都作了全面的论述,实际上是一部较早出现的《章学诚评传》,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章学诚的奋斗经历,著述过程和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后世的影响,列举了许多具体人物,认为章学诚的思想,影响了章太炎和龚自珍,尤其是对龚自珍的影响,似乎还是多方面的:“就像章学诚年轻时一样,他写了一篇建议文章,强调(如章学诚已经做的)各州府志应成为省志的资料来源。一年以后,他写了一本政治和哲学论文集,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章学诚的影响。”“章学诚刺激了年轻的龚进行有意识的政治思考这一点是重要的。”“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的地位得到公开而普遍的承认,还只是1920年以后的事。内藤虎次郎的著作,尔后是胡适的著作在中国和日本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章学诚不仅成了学术好奇心的对象,而且作为一个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并对其职业有着高度创造性思想的中国历史学家,章学诚在帮助中国史学家顺应新的史学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在章学诚那里找到了历史和哲学方法的激动人心的启发,这些历史和哲学方法帮助他在自己从西方所学到的东西上加上了中国的印记;顾颉刚说在年轻时读到的一篇章学诚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他

的思想；冯友兰则求教于他的有重要意义的对中国哲学史的意见。”

“章学诚的名声是稳固的。然而，顾颉刚中只是对章学诚思想的一个片断有所反应；历史学家把他技术方面的东西看成是独立于其哲学母体的；甚至胡适也误解他；冯友兰虽然充分地利用了他的思想，但未能看到他对史的普遍化是‘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历史’的，而不是从历史本身的角度。章学诚未能很好地为人所理解，对大多数人来说，他还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还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思想家。”以上所引说明倪德卫教授在该书中很注意章学诚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这确实很重要，因为在章氏的学术思想中确实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所以，侯外庐先生将他作为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而列入《中国思想通史》中《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卷，那么，这些启蒙思想对后世究竟有哪些影响，都有待于进一步作入深研究。近日在绍兴参加“章学诚逝世二百周年座谈会”上，有位朋友就曾讲了章学诚对鲁迅也是有影响的。我对此没有研究，所以也就不好轻易地发表意见。不过我还是可以举出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在评论《三国演义》时就引了章学诚的论述，书中说“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对演义这一文学体裁进行评论时，认为应坚持“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并以《三国演义》为例，该书“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之惑乱”。鲁迅在评论该书时便引用了这一论点。可见鲁迅对章学诚的著作，不仅阅读过，就连章氏笔记也都看了。所以今后研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对后人的影响，应当成为研究章氏学说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直接体现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总之，倪德卫教授这部著作，对章学诚的评论是相当全面的，

评价也是相当高的,认为“章学诚像 17、18 世纪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人一样,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摆脱过去,思考出新的见解,提出新的问题,用新的方法解决旧问题。与其他人一样,他最终也未能摆脱传统的束缚。”(以上所引均见该书第十章《迟来的赞誉》)。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生平与思想》英文原书封皮内出版者写的著作介绍,也确实概括了该书的基本观点,介绍是这样说的:“章学诚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他没有口授的‘门生’,没有继承者。他缺乏耐心仔细考察当时时髦的考据之学,在自己的著述中,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几乎是现代的思辨特征。回顾历史,作者倪德卫视章学诚为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作者的评论,还是出版者的介绍,都值得我们很好的重视,章学诚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应当尽可能还其本来面貌。

需要说明的是,翻译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工作,因为每个国家语言文字,都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要想翻译得非常贴切,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内容是很难翻译,由古文译成白话,已经是如此,尤其是,有些文句、诗词,人们常说,“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若是翻译成外文,难度自然就可想而知。现在再从外文译成中文,有些地方与原意是否会产生距离就很难说了。

当然,还要说明的是,我这篇序只是对倪德卫教授这部著作简单作些介绍而不是评论。因为评论是要全面的,既要肯定其长处,又要指出其不足。我想这个工作还是留给广大读者来做吧。不过我也可以表示,书中有些观点和提法,我也不完全同意。这就说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存在,完全是正常的,这就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过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最终也许会取得一致看法。

倪德卫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语言,特别是中国思想史。他的主要著作,除该书外,还有《儒家思想的实行》、《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和《儒学之道:

中国哲学之探讨》等。近年来他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和夏、商历史还在进行研究,并发表了《三代纪年学之关键:“今本”〈竹书纪年〉》等论著。其研究精神令人敬佩。他实际上是在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位光荣的文化使者。

仓修良

2002 年春于杭州

## 序 言

不久以前,中国研究截然分为两个独立的阵营,既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历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又有更偏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这一分裂的后果是人们在透过双焦镜头看中国,学术研究未能统一而使两个视野相互联系。二十年来,全球范围的学术研究已经为纠正这一双重构图做了很多。但不管怎样,现在和过去总会使我们的注意力感到无法兼顾,若要看到单一的图景则仍需努力。

我对章学诚的兴趣始于上述问题成为中国研究中的尖锐问题之时。我试图透彻地检视某种东西,它是如此恰当地定位于历史以至于使我们不会忽略它与当今的联系,也不希望把它当作伟大中国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外的东西来理解。我发现,通过记录和悟解一个人的学术探索生涯可以最好地满足我的愿望。一部传记,如果成功的话,可通过复活过去,使之合理化并相互关联。但它的作用不止于此。对中国来说,18世纪既是末代王朝的鼎盛时期又是现代痛苦的开始时期,它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之花最后的璀灿,以及处于“大遭遇前夜”的中

国传统的形态。在自己的思想中,章学诚把他的文化历程进行整理和总结,提示了它是各种价值标准和学术难题相组合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与各种他所能认识的最基本的问题作斗争。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史的性质、学问和著述的价值、个人洞察力的重要性。章学诚有时也会劳神于一些荒谬的问题或拘泥于细枝末节。他在智力上既是非凡的,也无疑是平凡的。

促成我写作此书的工作并非只是从最近才开始。在此我要感谢许多人为我提供建议和指导。1948年洪业教授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向我介绍章学诚其人,并且本书承蒙他亲笔题词“学际天人,才兼文史”(见封页,引自《旧唐书》,见本书36页)。1942年,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开始教我章学诚使用的古汉语。1953年杨联陞教授和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尔(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在哈大指导了我的关于章学诚的专题论文,他们坚持认为我应把它写成严肃的诠释之作,而不应只把它当作哲学练习。我想,章学诚会特别对他们的智慧表示赞赏。我也对哈佛—燕京学社、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委员会、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拙著的各重要阶段提供的慷慨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深深地感谢其他朋友。房兆楹先生阅读了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并为我找到更重要的资料提供指导。对耶鲁大学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教授的鼓励、指导和不倦的教诲,我万分感激。主要由芮沃寿教

授负责的中国思想研究会主办的系列学术会议为我理解章学诚及其学术背景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检验标准。我从与会者那里获益良多。让我留意一本有用的书、文章或说法的朋友有：罗伯特·H·布劳尔(Robert H·Brower)、杰罗姆·加瓦纳(Jerome Cavanaugh)、陈受荣、陈颖、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许芥煜、康拉德·谢乐考尔(Conrad Schirokauer)、卫德明(Helmut Wilhelm)和其它许多朋友。我的朋友柯蒂斯·贝奈(Curtis Bennett)最近担任斯坦福大学古典文献客座讲师,他爽快地通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批评意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助理编辑萨拉·H·博义德(Sara H. Boyd)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为我做了同样的工作。拙著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他们耐心的劳动。对我的妻子倪康妮(Cornelia)和孩子们,我要表达另一种难以形容的谢意。

我最后必须向章学诚本人致以感激。对他的研究不断把笔者引向我已在其它文章中所揭示的那种远见卓识。透过他死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隧道形成的尘垢,我花了十余年时间来发掘他的思想,揭示他的个人生活。如同其他任何生者,章学诚成了我的一个朋友。我曾嘲笑过他,有时对他很不耐烦,然而,我也敬仰他,学习他,远远超过他所能想像的。我知道他是一个男人,我从他那儿得来的收获起码要回报以感激。

对章学诚生平和思想的叙述计划是简单的。拙著首先是一部传记。随着章学诚生平的展开,我会沿着发展的脉络去揭示他的思想。在章学诚生平某一时期的思想

特别丰富的情况下,我会离开传记的行文方式,辟出一章甚至更多章节全部用于揭示其哲学思想。在任何时候,章学诚的兴趣总是倾向于围绕某个问题的,故而有可能把这几章围绕几个主题来写。但这样做只能部分地令人满意。在逻辑需要的情况下,在阐述章学诚的思想时,我会在时间上作前后的跳跃,不过我尽量设法交代清楚。最后,我坦率地谈了我对章学诚的思想的看法。有些人以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可能会坚持认为,章学诚的问题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我的,无论好坏,他的概念就肯定超越我的批评范围。对此我不敢苟同。似乎对本人而言,如果上述说法是对的话,那就根本无法理解章学诚了。

倪德卫

1965年9月